

中国文学何以成为当代

——《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的意义阐释*

刘志华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1949—1976年的中国文学,是国家整合各种政治和文化资源制度化建构的结果。和现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在形式和意义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如何揭示这些变化的内外原因,这就牵涉到新中国国家文学的具体形成和展开过程。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单纯从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的角度很难厘定清楚,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无法解释中国文学由现代转入当代并进行具体实践的历史逻辑。从国家、政党、社会和个人的互制和互动关系切入研究,就可以更全面地揭示当代文学的生存真相,从而有效阐释当代文学之所以有此历史态的社会文化原因。王本朝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新星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从权力、政治、文化的角度,从制度层面来考查当代文学,在重构当代文学生产秩序历史现场的同时,为研究和阐释社会主义文学传统提供了文学制度方面的依据。

当代文学是在高度政治化和组织程序化的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文学借助文学制度而与社会政治缔结了非常复杂的关系,同时,社会政治也通过文学制度干预、引导,进而控制文学的生产形式和审美范式,以便把作家的创作、作品的意义和读者的文学期待纳入国家意识形态之中,达成对当代文学从“秩序”到“意义”的转换。当代文学的创作和接受都是在与制度的相互作用下发展的,从制度层面,可以有效揭示1949—1976年的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社会权力真相,也为研究当代文学打开了思路,开拓了空间,对今天的文化建设而言,也不乏启示意义。

当代文学比现代文学的制度性更为明显,尤其

是与社会政治权力的关系越趋复杂,文学现象往往与当代政治文化纠结在一起,如何揭示出当代文学制度的内涵和对文学的影响,需要在芜杂的史料中掘沙取金。《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从文学机构、作家身份、文学传播、读者设计、文学批评、文学政策、文学会议等方面具体论述了当代文学制度建立的历史依据,主要内涵和演变进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探讨了当代文学中的制度设计和衍变,尤其是从历史当事人的角度来分析政治权力何以介入、如何介入,以至于最终如何掌控当代文学。对历史现场的清理和还原,既有理论的依据,也有事实的辅证。著作通过制度内涵的分析到制度创设中历史意图的分析,揭示了制度如何参与当代文学的建构,以及如何成为影响当代文学进程的重要社会权力因素。目前,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人民性”、社会文化资源配置影响等问题,但从制度层面系统地研究当代文学传统的形成和展开过程,王本朝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还是第一次。

现代文学主要是在启蒙和战争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文学制度更多表现为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主要体现为文学如何介入启蒙、革命、民族国家等社会问题,从制度的层面来看,现代文学保持着制度规约中更多的自由度。但从延安文学开始,由于当时的现实环境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欲求,开始出现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制度空间”^[1],加上苏联的影响、后来第一次文代会的当代文学价值设计以及关于工农兵文学的想象,使当代文学制度更多体现为一种政治化和权力化特征。“政党政治、文化区域和个人体验共同改变了中国新文学的基本

* [收稿日期]2007-05-12

[作者简介]刘志华(1972—),西南大学文学院,讲师。

格局,文学秩序被政治意识、文化价值和审美观念所规约和强化”^[2]。而在新中国建立后,政治权力就成了文学秩序的主导性力量,成为当代文学制度的核心要素。当代文学制度基本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实践中展开的,同时,当代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对当代社会的文学构想,曲折地反映了作家的心理和创作动机。

在1949—1976年间,文学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新生政权的社会想象,而对各种文学资源的整合和清理,以体现政党的政治意图,主要是通过文学制度的形式来实现的,文学制度成为当代政治权力介入文学的主要形式和通道。

当代文学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国家通过组织形式来规范作家行为,创设文学的形式和意义,从而实现文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化。在中国当代社会高度组织化的时代,文学组织对作家具有十分重要的身份赋予和自我认同的意义。“在体制中生活可以为作家个人的生活、名誉和利益带来诸多好处,尤其是在一个资源稀缺和个人价值和利益无法得到承认和保护的时代,组织和群众对个体而言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护身符,长此以往,还会演变成一种自我内在的需求,种种不合理或不适应都会在体制的消磨中逐渐内化为心理和生活上的‘必然’和‘应该’,这时,外在的体制就变成了内在心理的情感需求”^[3]。当代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认同,构成了当代作家创作与文学制度以及社会欲望间的共谋关系,文学制度往往既表现为一种显在的形式,对作家的创作造成影响;同时,文学制度也可能成为一种内在的认同因素,影响到作家内在的情感倾向。当代作家是在既皈依又背离的矛盾中展开写作的,这造成了知识分子在写作中的紧张状态,对意识形态的刻意俯就和不自觉偏离,出现了当代文学中的政治化写作和潜在写作。从文学制度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入手,以及知识分子本身的生存状态,可以更好理解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在创作中的断层状况,以及当代文学新的文学形式和意义是如何在文学之外的力量中催生的。

文学组织是文学领导和制度规范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和保障。在当代文学阶段,文学的组织领导是政权约束文学的显在形式,现代文学中的同人社团被当代文学的各种文学组织所取代。文学组织给予文学创作高度的集约化,可以快速整合资源和统一步调,有可能带来社会主义文学在一定时期在某些方面的繁荣,但也造成了当代文学的资源耗

损。当代文学的组织化,是在当代社会高度组织化中形成的,体制本身的局限和文学的自身属性使当代文学制度在这方面呈现出更为明显的负面意义。从国家政治的层面来讲,“实现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特点”^[4],从领导方式,意义和作用的分析中,可以见出1949—1976年间文艺批评和文艺斗争的实质是“是否坚持了党的领导”的政治标准的判断。文学领导的具体工作方法 with 领导科学之间往往存在偏离,尤其是宗派主义对当代文学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文学宗派降低了文学领导的效率,甚至影响到文学领导工作的开展”^[5]。从理论创设与实践错位的角度讨论文学领导对当代文学的意义,尤其是通过历史当事人周扬等人的分析,从一些史实的钩沉中清晰地再现了这段历史,避免了简单历史判断中的偏执,也使读者有了更清晰的历史现场感。

《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还从制度化生存的角度揭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况以及对创作的影响。身处各种组织中的作家,一方面有组织的依靠,可以供养生活,享受特权,一方面也造成了其个体的“弱小”和感到“落后”,以至于当代知识分子在国家和人民面前,心灵深处负载着沉重的“原罪”意识,从而“成为新社会的顺从者和歌咏者”^[6]。当代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隐秘,构成了知识分子与文学制度之间的复杂关联。这为我们理解当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提供了翔实的基础和理解的基石。所以,文学制度的研究并非完全是文学的外部研究,它可以借此揭示出外在社会因素如何影响创作主体内在心理的变化,从而影响到他们创作的形式选择和意义呈现。

在文学传播方面,它主要从文化生产资料的配给角度来分析新中国文学与国家资源间的关系,他注意到这样的现实,“公共领域的解体也潜在地影响到文学的生产方式,文学离国家和单位似乎更近了,与社会和民间的距离却被拉大了。”^[7]新中国对文化的国家垄断,其目的和结果是国家文学的产生,文学在被社会意识形态的收编过程中获得了时代话语权力,甚至可以借助政治权力产生轰动效应,成为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中心,但是也付出了一些文学的额外成本,尤其是在艺术性方面留下了诸多遗憾。从文化资源的国家配给角度来解释当代文学的国家文学性质,从社会公共领域的解体来分析当代文学在形式意义上的变化,颇有使人“柳暗花明”之感,也是令人信服的。

在当代,国家对文学资源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掌控文学刊物来实现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文艺刊物与出版开始了由国家‘垄断’与监督控制的年代,形成了所谓媒体的‘中央控制’模式。”“文学刊物变成了机构刊物”^[1]。在文化资源的国家控制方面,著者以最典型的《人民文学》和《文艺报》为个案,分析了文化资源国家掌控所带来的资源整合的正面意义和由此而带来的对文学资源的负面损耗。把文学作为社会文化资源的一部分,放在当代社会资源计划配给的角度来考查文学的生产,符合当代中国的文化实践。王本朝教授的研究思路,也能够启发我们对当今文化资源的国家和市场双重配给状态的思考。

当代文学的工农兵性质,作为国家掌握的一种文化资源,人民成为文学最大的接受群。然而,人民往往由于知识水平和审美意识的局限,很难对文学展开专业的批评。于是,当代文学读者的虚拟性设计就应运而生,这也是当代文学制度的重要内涵。当代文学批评中的读者实际上是人民需要的国家想象。结果是“文学的人民利益成为文学的道德和纪律,成为规范作家和文学的制度力量”^[2]。人民需要遂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话语方式,从而影响到作家的价值选择。但是,究其实质而言,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人民想象是以人民名义的官僚意志和国家意志的体现。所以,实际的情形是1949—1976年的文学隔断了作品与读者的联系,而基于虚拟读者的价值合法的想象,成为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这种想象性的价值往往成为作家创作的目标,使当代文学出现了与生活脱节或极度美化生活的虚假状况。由此进入对当代文学中的虚假现实主义讨论,比单纯的作品分析具有系统性和根本性。

在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往往是错位的,甚至是相互背离的。王本朝教授把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进行了区分,把握住了当代文学批评中的“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话语方式”^[3],隐蔽而无所不在地对当代文学造成的影响,文学批评“起到了文学制度的作用,规范和制约了文学的发展”^[4],尤其是文学批评充当着“婆婆”的角色,通过意识形态的判断来实现文学的规范,从而实现党的政治意图。正是当代的文学批评标准,区分了作家作品的地位,建立了当代的文学秩序,构建了新的国家文学。因此,“文学批评并不是文学内部的事,而是社会现实和政治利益在确立文学意义和建立文学秩序的代理者,是文学生产取得合法

性的重要关口”^[5]。在当代文学中,文学批评往往成为政治权力和国家意志对文学的渗透形式,文学批评在偏移文学本身的同时,造成了对文学的政治价值设计,影响到作家创作的价值选择和读者对作品的理解。

在当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就是各种有关文学的会议的召开。各种文学会议具有仪式性和“导演”性质,“会议成为文学秩序调整和转换的标志,成为国家和政党对文学展开叙事的一种方式”^[6]。文学会议是文学规范的重要建构形式。一方面可能带来对以前文学政策的调整,一方面也可能因会议而产生新的文艺政策,进而影响到当代文学的进程,因此,文学会议往往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它常常以盛大性的方式,确立一种创作观念或者反对一种创作观念,为文学制度的实施提供一种舆论准备。1949—1976年的文学会议,常常预示着各种政治化文学理论的出台,通过对文学会议的分析,可以看到当代文学中的政治权力如何通过仪式的形式与社会欲望和人民期望合谋,从而成为具体的规范和社会的合法性要求。文学会议可以把政党意志和人民需要通过一种仪式的形式确定下来,并成为文学在一定时间内遵循的准则。

当代文学制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国家、政党、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文学等复杂问题,尤其是站在当代来研究一些当代问题,这需要学术洞见和勇气。问题的复杂性和语境的复杂性也使著者常常“有难以说清楚或不宜说清楚的情况”。对当代文学制度的研究,王本朝教授是在严格的文学史层面展开的,但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体味到作者通向现实和未来的旨意。如后记中所言“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还是社会主义文学制度本身,都带着有一定的‘实验’性质,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既要满足社会主义的文化战略目标,又要能够创造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学。”^[7]由此观之,这本严谨的学术著作,其中也不乏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文学走向进一步繁荣的热切期待。

【参考文献】

- [1][2][3][4][5][6][7][8][9][10][11][12][13][14]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M].新星出版社,2007,15,1.51.64.74.102.105.116.116.194.195.205.239.238.

(责任编辑:朱德东)